

惠及人类的“中国模式”远没形成

庞中英

摘要：中国到底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什么真正的思路、模式？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哪些人类通用的价值？过去三十年，为了以欧美经验为范例的现代化，中国从世界汲取、借鉴（所谓“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而却在提供解决人类困境、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模式上相当不够。尽管中国的模仿和学习式的现代化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宝贵的，可以供世界作为“他山之石”重新思考世界发展和世界体系问题，但让中国人惭愧的是，中国也许还没有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应付世界大势和有助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模式”。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这其实是一个很重的、很大的、很不易回答的问题。其中一个难点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在世界（世界构成）的角色（作用）有所不同，中国对世界贡献相应地不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涉及中国对解决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的作用，也涉及到中国对人类基本价值（如正义、平等、民主、发展）等的贡献。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站在不同的立场（包括利益和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有所不同。评估中国的世界贡献，需要多学科的努力。本文仅仅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思考。

理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笔者认为，在考虑中国的世界贡献时，下面几点也许特别重要：

第一，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该理解为中国对人类世界的贡献，即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应该把世界理解为“人类”，即“全人类”，不分种族、族群、国家、地域、背景、条件，这是人类的世界。1956年，新中国诞生不到十年，万丈豪气的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毛泽东显然感叹和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很不够，所以，确立了“应当”对世界做出“较大贡献”的国家目标。毛泽东用了“人类”而不是一些人仍然热衷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一词。今天评价起来，这样的遣词其实是很具有未来导向的意义的。它远超越了民族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能涵盖的，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目标，具有强烈的普遍感召力。新中国诞生后，全世界期待新中国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作为矫枉过正的一个表现形式，遗憾的是，一些人一度对政治伟人毛泽东提倡的“人类”以及与“人类”一词相关的术语莫名其妙地退避三舍，甚至对“人道”、“人道主义”和“人类安全”等缺少理由的狭隘挾伐。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这个议题，一个比较好的出发点是“人类”。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也引用毛泽东的名言的原因。

但是，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今天讨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世界环境显然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中国已经“融入”或者（被）“纳入”全球化。“中国”一词已发生很大改变，所以，相应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必须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的世界贡献问题。

第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理解为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从19世纪末起，英美最大的一个世界图谋就是“开放”中国¹。而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则一直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抵制这种“开放”。让西方感到吃惊的是，70年代末，中国选择了主动的“开放”。所以，如果讲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可能最大的贡献正是“对外开放”，即通过“吸引外资”、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服务市场、资源市场、知识市场）而加入西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驱动的“全球化”，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一个最大特征。不仅如此，美欧的金融资本——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由于中国主动被“纳入”全球化而受到兴奋无比的刺激。到美国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2005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国是美国主导的“世界股份公司”（The World, Inc.）的一个关键的“股东”（stakeholder），只是美国“董事长”对中国作为新的“股东”在公司中的“负责性”的信任程度不高，所以，要求中国成为“负责的股东”（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到奥巴马政府时，不顾可能得罪美国最为重要的长期盟友欧洲和日本，奥巴马政府一再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第三，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该理解为对国际体系的贡献。人类世界毕竟仍然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即国际的世界。在国际层面，中国对世界（人类）的贡献非常多，这里举几个现成的例子：

- 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尤其是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中唯一的非欧洲的、非西方的、发展中世界的、亚洲的常任理事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长期控制、主导世界体系的局面，帮助了世界上其他许多人类和民族的政治觉醒，让失衡许久的世界走向新的平衡。中国在联合国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使联合国更普遍，有助于找到真正的全球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穷国或者“发展中国家”一直以这种或者那种理由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占据“基础”位置。中国在冷战后期逐渐走出两级体制，中国认同自己为“第三世界”或者“不结盟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可能是改变世界政治从美苏两级控制世界政治到美苏两级难以控制世界政治的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在外交政策原则上，中国小心谨慎地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在发展中世界一些显然是内部因素显著的冲突中，中国以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和“缔造和平”的方式介入这些冲突。人们把提供维护部队和其它支持的国家叫做“贡献国家”。最近几年中国连续不断地扩大对联合国维和的参与，被公认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联合国维和贡献最大的国家。
- 目前的国际体系，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从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角度，美国的“贡献”最大。中国一度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之外，后来逐步加入，却直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重要参与者”；但是，随着中国试图增加在国际制度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及意识到在国际制度中“规则”（标准）提供、日程设定的重要性，中国对国际体制的“贡献”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的趋势。美英在二战后主导（“设计”）国际制度时，故意把对世界和平的维持和对世界经济的管理

¹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规划的鼻祖凯南（George F. Kennan）的说法，19世纪末，美国势力就介入许多的世界大事。尤其是，“1897年末和1898年初”，崛起的美国对中国被欧洲（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列强“分割”的担心不断增强，于是，美国人接过英国人最早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Open Door）策略，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门户开放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Open Door），向欧洲列强宣布，美国也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欧美诸列强在华的权利均等，以冠冕堂皇的“维持中国领土和治理的完整”为这种原则的“正当性（合法性）”的依据。凯南就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在芝加哥做了两次讲座，见：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Expanded Edition), II Mr. Hippisley and the Open Door and III America and the Orien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分开处理。尽管存在安理会和常任理事国的安排，国家主权及其主权平等的原则（大小国家在国际法上一律平等）在联合国体系贯彻，但在（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大小国家则分别占有完全不同的“结构性权力”，超级大国和大国操纵和控制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后，先是作为该体系的受援国，接受了来自国际金融组织的大量贷款，后来则逐步脱胎换骨，不断增加对基金组织的贡献。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是对基金组织的新增“借贷能力”（lending capacity）做出“贡献”（contribution）的几个主要国家。当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结构中的决策权力（以“投票权”为标志）仍然相对很小。

- 对国际规则的贡献。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对国际规则贡献屈指可数。不过，中国对国际规则的贡献还是有一些的。例如，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中国与其它发展中经济体提出了“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官方翻译为“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的国际规则。这一规则得到了普遍接受，尽管南北国家对此有不同解释。
- 对国际发展的贡献。中国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开始对世界发展做出了一些重要贡献。目前，中国与世界银行组成了伙伴关系，在非洲、南太平洋等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落实。中国不断增加从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在国际社会为穷国说话、减免一些穷国的债务、增加发展援助、与穷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第四，中国在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上遭遇重大的转折点，即大危机时，也是有贡献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但在危机关头，有的国家可能正好发挥了关键的积极作用，为扭转世界颓势做出贡献。冷战是一场巨大的世界危机。中国对冷战的终结有什么贡献？笔者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猜想，中国在冷战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立场选择——远离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时与另一个霸权国家美国组织新的关系，后来回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无论美国还是苏联，最终难以“打中国牌”。尤其是，中国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而全球化是冷战走向终结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国在冷战后期的战略抉择可能是加速世界冷战终结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世界体系正在经历的一场大危机。以金融危机为标志，世界进入不确定性和危险将大大超过确定性和红利的时代。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依据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中国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中国为对付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内外政策）看待中国在历史危机时刻对世界的贡献。如果中国能够独立思考，在对付目前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危机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将更大。

最后是“未来观”。我们的世界是否拥有未来？是“世界末日”，还是新世界的开端？这里包括人类基本存在（大和平和战略稳定）、发展（现代性）的可持续性（如何克服工业化内生的不可持续的毁灭性的因素）。如果中国在人类的和平、进步、治理上做出贡献，世界由此更加趋向根本的光明未来，这将是中国的根本性的贡献。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仍然不足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仍然是相当不足的。这种不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足。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实体）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只占4%，远低于美国的25%。尽管充满活力，但中国经济却是一个高度“被动的”经济体，即主要以“开放”国内市场、资源，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不在乎低工资，放

弃国内市场份额，为外资提供生产和出口基地来谋取“发展”。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但却还非“火车头”般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市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地位遭到重创，却仍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者。中国有着5倍于美国的人口，却仍然不能取代美国的世界经济“火车头”地位。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是“被”全球化的对象。美国是全球知识、技术创新的源头，是最大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在全球“知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在过去30年主要是美国知识和技术的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对世界知识、创新的贡献有限。中国已经意识到不仅“开放”自己，而且要求别人“开放”、“打开”别国市场的重要性。但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国际生产行为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目前的全球化可能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而实质性地大调整，甚至放慢步伐的情况下，面对不仅市场障碍，而且政治和安全的障碍，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将变得困难起来。中国如果不能如同欧美日那样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s）、知识创新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继续是相当不足的。

- 第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不足。仅以非政府国际组织为例。20世纪，对人类和平与治理做出巨大贡献的恰恰不是联合国等国际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在冷战期间实质上瘫痪，而在冷战后，联合国没有为防止中非的大屠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金融危机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反而因为日本等昔日的战败国谋求联合国改革等而争吵不休），而是数量巨大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当然，西方为基地的一些具有特定的狭隘政治使命的非政府组织与其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漠视非政府组织后面的政府组织，但是，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和作用是其巨大的。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缔造和贯彻“国际人道法”、减少暴力、为暴力中的受难者提供援助等做出了公认的巨大贡献。1945年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治理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缺失的地方，而且为一个新的全球的国际体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人们都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多数情况是政府主导，以政府的面貌出现。由于中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发育滞后，与来自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相比，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屈指可数。
- 第三，中国对走向全球治理的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²的贡献不足。世界的现实是，一方面，全球问题太多，且快速增长，许多看似属于当地（地方）的问题，却一定有着深刻的全球（国际）根源，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从来都是很不足的。尽管中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开始增长，但总体看是有限度的。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实力相对有限，能拿出来贡献给世界的还是少部分，况且，即使中国决策者有意多为全球公共产品贡献，国内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政治压力，也迫使任何试图愿意增加全球公共产品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这部分更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后期因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华防范政策而在国际事务中“不带头”，既然“不带头”，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
- 第四，中国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还不够。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到底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什么真正的思路、模式？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哪些人类通用的价值？过去三十年，为了以欧美经验为范例的现代化，中国从世界汲取、借鉴（所谓“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而却在提供解决人类困境、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模式上相当不够。尽管中国的模仿和学习式的现代化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宝

² 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内容，不同的研究者对此理解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全球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力量平衡、开放的国际经济及有权使用全球公域等，见：奈：“国际政治中的领导权”，刘珊珊译，中国国关在线，<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842>。

贵的，可以供世界作为“他山之石”重新思考世界发展和世界体系问题，但让中国人惭愧的是，中国也许还没有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应付世界大势和有助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模式”。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国际政治

罗列一些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大量事实和例证、说出世界上对中国的世界贡献的承认是容易的，但是，这样的讨论没有触及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世界的贡献的政治。笔者认为，中国对世界贡献包括两个根本性的世界政治问题：

第一，1979-2009年的三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许多内外人称道，包括让世界陷入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势力。但是，对中国的称道回避了一些关键的政治学问题：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是对“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对“人类”（包括人类1/5的中国人）或者“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对资本或者金融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另外，“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只是一面之词：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人类、生态代价和谁为这样增长的外部性付出（承担）代价？作为传统的增长模式的放大，中国的增长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也是对世界的巨大冲击。作为世界人类的最主要部分之一，中国的社会和生态承担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和其它人类代价。欧洲变得那么清洁，而中国则变得那样肮脏。欧洲的清洁和中国的肮脏是“相互依存”的。但欧洲从来不愿意承认欧洲的清洁其实建立在中国的肮脏的基础上。相反，欧洲人一致承认，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体，中国的增长是全球“气候改变”新的最大因素之一，要求中国为遏制“气候改变”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目前不得不迫于压力在气候问题上再次做出“世界贡献”。这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多重贡献”了。

第二，国际贡献问题的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国际（全球）领导权”。根据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说法，霸权是使世界（被统治者）达成一致的能力，是行使“知识上领导和道义上的感召”（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的能力，是使被统治者确信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同（“同舟共济”）的能力³。用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话说，既然如此，霸权国家就充当了世界的领导国家。“领导”就是可以被定义为“贡献”。美国一直认为自己为世界贡献很大，而最大的贡献不是美国国务院给穷国提供了多少发展援助，或者减免了多少穷国欠美国的官方债务，也不是美国国防部向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海军陆战队，而是美国认为自己在世界体系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霸权被认为提供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即“霸权稳定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实际上就是试图在理论上为霸权对世界经济稳定的贡献提供解释。

不要说与美国相比，就是与其它大国，以及一些中小国家相比，中国拥有的国际领导权相对有限。按照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说法，“领导权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政治过程：领导者、追随者及其互动的环境”⁴。中国不是“领导者”，也不是“追随者”（即“被领导者”），更无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即上述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一些国家即使愿意与中国走近，也要看美国的反应决定与中国的距离。如果美国认为与中国的接近可能挑战

³ See Martin Griffiths, Steven C. Roach (ed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88.

⁴ 同注释2.

美国的领导地位（霸权），这类国家与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限度就出来了。

中国被认为是“崛起”国家，甚至可以“崛起”到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领导国家的地步，但是，中国是否意识到了国际领导权的重要性？中国引进和实践加强“软实力”（soft power）、中国谋求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更大“话语权”、中国与俄罗斯一起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中国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非洲的新关系，这些对世界的贡献之举是中国进入争取国际领导权的政治过程的早期标志？若此，中国的国际领导权状况是否将改变？在研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时，国际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涉及作为国际贡献的中国的国际领导权，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仍然将是小打小闹的原始意义上的贡献而已，不涉及国际政治的改变或者转型。

结语

一国，尤其是如中国这样的文明悠久、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的大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一个含义丰富和复杂的概念，有必要分别在广义（综合）和一个个的具体方面对一国对世界的贡献加以讨论。历史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中国曾经对人类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未来中国，如果世界头号人口大国不仅超越美国变成全球经济规模第一而且在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上对人类进步有创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是极其巨大的。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如何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在战略上，中国如何避免对世界的贡献不足或者贡献过度；具有世界贡献的中国如何增加自身的国际权力，尤其是国际领导权。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